

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的話

目前反右派斗争已經在全國各地轟轟烈烈地开展起來了。為了帮助大家勝利地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行說理斗争，更有力地駁斥右派謬論，我們特从全國各地報章雜志上挑选了十數篇批駁右派謬論的論文，匯編成这个小冊子，供大家學習參考。

目 錄

- 論真假社会主义 山西日報社論 (1)
駁右派分子對我國政治制度的進攻 李景蔭 (7)
駁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論 孫曉村、馮和法 (14)
農業合作化是冒了嗎? 雨佳 (34)
右派分子为什么要对粮食政策大举进攻? 溫一才 (42)
斥“肅反擴大化”和“沒有法制”的說法 張燕征 (51)
- 天下究竟應屬於誰? 理夫、林岐瑞 (57)
擊退右派分子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進攻 吳江 (65)
決不允許取消以馬列主義作為我們的
指導思想 高放、張世昌 (77)
共產党能够領導科学、文化和教育工作 安子文 (83)
- 論社会主义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 李哲人 (89)
駁資產階級右派關於“民主”的謬論 矢乔 (104)
駁“新民主集中”論 安羽 (113)
何物自由主义 楊東蓀 (122)
- 徹底粉碎右派的進攻，繼續發展和巩固
中蘇偉大友誼 錢俊瑞 (133)
从右派反蘇罪行說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錢俊瑞 (140)

論真假社会主义

7月7日上午，也就是本报揭發了右派分子馬超羣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后的第二天，馬超羣怒氣沖沖地闖進了本报編輯部。他進門來劈口就質問道：“是那个編輯編發的‘請看一个工程师的右派言論’一稿。”他隨即拿起載有这篇文章的報紙，指着这篇文章念道：“我覺得我們鳴放須站在这样一个基礎上來進行鳴和放，这个基礎就是和平、開明、進步的社会主义。”然后他又厲聲質問道：“这怎么能在按語中說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呢”？看！这位右派先生的尾巴翹得多高啊。他竟得意地以为用什么“和平、開明、進步的社会主义”这一招牌，就可以对本报編輯部大大地將上一軍。

据了解，在右派分子中，类似馬超羣这样的涂脂抹粉，放毒害人，实在不是少数。他們口甜心毒，借社会主义之名，反社会主义之实，伪造社会主义的包裝，推銷資本主义的毒品。他們玩弄这样的伎倆，一是为了使人容易上当，中毒而不知其毒；二是为了在放毒失敗时妄想能够躲避人們的追究和打击。事实上有些缺乏政治斗争經驗的人，不免暫時为他們这种糖衣裹着的炮彈所迷惑。因此，我們就必須剖析真假社会主义，戳穿假社会主义的騙局，使人透过“糖衣”，看到“炮彈”。

如果我們稍微注意一下，在所有的右派分子中，除过葛佩琦这个狂妄之徒以外，那个右派分子不是打着“拥护社会主义”、“帮助党整風”的招牌，來進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動呢？全國右派分子的大头目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不是比馬超羣之流講的“拥护社会主义”更动听、更巧妙、更漂亮嗎？章伯鈞不

是曾說過他“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服務”嗎？羅隆基、章乃器不是異口同聲地說他們“整個生命是交給黨的，全部精力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就是把骨燒成灰，也找不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東西”嗎？可是在他們這個金字招牌的背後販賣的是什麼東西呢？是資產階級的“兩院制”，是為反革命分子申冤的“平反委員會”，是讓資本家不必繼續改造的“定息不是剝削”。總之，是想使我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就是重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人宰割的地位。馬超羣這個右派分子在“和平、開明、進步、社會主義”的招牌下，販賣的又是什么東西呢？是“我國外交政策不應受蘇聯牽制，我國應同美國和好，否則就是教條主義”、

“黨員在羣眾中製造互相猜疑，是今天產生混亂和分歧的根源”、“黨的汇报制度是產生矛盾的根源”……。我們要加強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般的團結，他却說這是“受蘇聯牽制”；我們反對美帝國主義霸占中國領土台灣，反對美國擴軍备战的侵略政策，他却說這是“不同美國和好”；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說成教條主義，他把共產黨干的好事情說成壞事情。可見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的馬超羣和我們沒有共同的語言，他所謂“和平、開明、進步”，不過是包藏禍心的好聽的詞句。馬超羣玩的這種手法，也就是一切右派分子共同的手法，花樣雖然有不同，實質都是一樣。

利用社會主義的名稱或詞句作幌子，來為反動階級和反動集團服務，打着社會主義的招牌，來反對社會主義，這並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歷史上的封建貴族、資產階級、甚至希特勒，早就玩過這種把戲了。山西人都不會忘記過去的土皇帝閻錫山的毒害，閻錫山就用過什麼“物產証券”“按勞分配”“土地村公有”一套假社會主義的東西，進行欺騙宣傳，作為反共反人民，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血腥統治的工具。

因此說，真正的社會主義只有一種，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領導人民羣眾實現的社會主義。此外的社會主義都是假冒的社會主義。這可追溯到一百多年以前。即當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開始興起的時候，剝削階級的反動政治家即開始作起這種“買空賣空”的政治生意：偽造冒牌的“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來欺騙、蒙蔽和麻痹人民，以維持或恢復自己的反動統治。我們的偉大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早在他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中，告訴我們要學會識別各式各樣的反動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列舉的第一種反動的社會主義，就是“封建的社會主義”。在法國1830年7月革命以及英國國會改良運動中，兩國的封建貴族，被新起的資產階級打敗了，他們為了進行封建復辟，也曾裝模作樣，好象关心被剝削被壓迫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挂起了封建字號的社會主義的招牌。這樣就產生了“封建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對這種“封建的社會主義”，作了這樣的批判和諷刺：“這班貴族為了籠絡民眾，往往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民眾每次跟着他們走時發現他們的臀部蓋有古老的封建印章，就嘩然不恭哈哈大笑地散去了。”這種鬼把戲，閻錫山也曾憑着槍杆要過十來年，結果逼得民眾滿肚仇恨哭哭啼啼走開了，最後又把他抽根徹底地推翻了。今天大右派分子龍云、黃紹竑陰謀再步一下后塵，結果灰溜溜地連尾巴也夾不住了。

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批判的第二種反動的社會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當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以後，不僅加重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同時還迫使小資產階級在競爭中破產，把他們也推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小資產階級為了苟延殘喘地保持住他的小私有財產，也想要工人和他站在一起去反對資產階級，提倡社會主義。這就產生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作了如

下的批判：“但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積極內容來說，若不是想要恢復旧时生產和交換工具，亦即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便是想要把現代的生產和交換工具勉强重新塞進旧的所有制关系底框子里去，即塞進已被这些工具打破并且本來不免要被打破的所有制关系底框子里去。它在前后兩种場合都是既反动，又空想的。”今天在我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些資產階級与小資產階級的右派分子，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反对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統購統銷的制度。說什么：“合作化，統購統銷搞糟了”，企圖恢复小私有制和自由市場，妄想把中國社会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这不是和上面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小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一模一样嗎？

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批判的另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即“保守派的或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工人階級与資產階級斗争激烈化的產物。資產階級为了保全其对工人階級的統治与剝削，“……極力証明說可能使工人階級獲得益处的并不是某种政治改革，而只会是物質生活条件即經濟关系的改变。但这种社会主义所指的物質生活条件的改变，却絕對不是只有經過革命才能达到的資產階級生產关系的廢除，而是一种行政上的改良，即在这种生產关系基礎上实行，因而絲毫不会使資本和雇傭劳动間的关系有所改变，至多也只能替資產階級縮減其統治費用和使其國家事务簡單化的改良。”总之，它是“極力想使工人階級对一切革命运动持否定态度。”英國的工党与現在法國执政的右翼社会党及西德的阿登納，所喊叫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社会主义。寫到这里，不禁又想起了右派分子馬超羣所說的“和平社会主义”。就連这个名詞也不是他創造的。前英國工党領袖麥克唐納与現英國工党領袖艾德礼不是也主張“和平社会主义”嗎？对这种“和平社会主义”，麥克唐納在他“建設性的社会主义”一書中說得明确，就是“不參加工人階級与資本家之

間的殘酷鬥爭，它是位於這兩個階級之下的火燄岩的力量”。意思是說要工人階級政黨去隔絕階級鬥爭，不要工人階級去動資產階級一根毫毛。由此不難看出馬超羣所標榜的“和平社會主義”，是一種什麼東西了。由此也可以知道章乃器等在擁護社會主義的招牌下，所販賣的一套資本主義理論，是什麼貨色了。

最後我們還知道有一種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大家知道，這種“國家社會主義”，是一種絕滅人性的法西斯主義，但這個魔鬼也是給它戴上了社會主義的假面具。

近百年來中外的一些反動派，為什麼都打着“社會主義”的招牌，來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工人階級和他的政黨呢？希特勒在他所著“我的奮鬥”一書中說穿了這種秘密。他說：“吾人採用紅色，以其最能惹人注意”。我國的右派分子，雖未道穿他們的秘密，但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必須認識清楚，在社會主義陣營無比強大的今天，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中國六萬萬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任何右派分子要想偷天換日，他們必然要運用假擁護社會主義，真反對社會主義的策略；否則他是一步也活動不開的。

在當前反擊右派分子的鬥爭中，不管右派分子把“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說得如何動聽，也不管他們的招牌打的如何漂亮，要學會從這些漂亮的詞句與招牌的背後，查出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私貨來。要學會區別真假社會主義，在羣眾面前把他們的鬼臉撕破。

怎樣識別真假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的內容是表現在多方面的，但歸結起來，它集中表現在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兩個方面。在經濟制度方面，就是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政治制度方面，就是實行通過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兩項制度又是相依為命的，要想根除剝削，實現人類大同世界，就必須由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領導。在這兩項制度中，

去掉任何一項，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有些聰明的右派知識分子先生們，為我們設計了一幅上等的社会主义藍圖，叫作“苏联的經濟，西方的政治”。大家知道，“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即什么人占有生產資料，就必然要由什么人实行政治領導。他們要社会主义的經濟，听命于資產階級的政治領導，这能建成社会主义嗎？根本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一种騙局，是一种典型的修正主义。

一切右派分子，所以被称为右派分子，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問題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这两条根本制度。如章伯鈞、罗隆基、王文光以及上面提到的馬超羣，都是侧重于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党的領導与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知道把这个社会主义的上層建築反掉了，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礎——公有制——也就会跟着發生变化。章乃器、高振揚等，則侧重于反对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公有制。他們知道把这个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礎搞垮了，社会主义的上層建築也会跟着垮台，資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也就可能实现了。

总之，凡是主張并拥护这两条根本制度的人，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之，凡是反对这两条根本制度的人，不管他們采用什么形式，都是假社会主义，必須徹底揭穿，坚决反对。

（山西日報1957年9月1日社論）

駁右派分子對我國政治制度的進攻

李 景 蔭

不能混淆基本制度和具體環節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攻黨和人民的要害之一，就是向我們的政治制度開刀。他們採取各種巧妙的方法陰謀否定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為了證明我國政治制度“不適合”經濟基礎，為了給她的謬論製造根據，首先用偷天換日的妙法取掉我們政治制度的階級內容，否定其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把它說成是一些具體制度的“組合”。林希翎認為：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官僚機構、人事制度、等級制度、保密（擴大化）制度等小的制度組成了總的制度。這樣一種抽梁換柱的法術，其目的就在於：一方面否認我國政治制度的階級內容，對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進行誣蔑和中傷，挑撥黨與人民羣眾的關係；另一方面就是給她那徹底推翻現存制度的綱領製造證據，歪曲政治制度是否適合經濟基礎的應有標誌，便利于她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惡毒煽動。

我國當前的政治制度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所謂各種小制度的“綜合”呢？當然不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制度的階級內容就是由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作主，為了保衛并服務于工農羣眾的利益，另外也適當照顧到那些出身剝削階級但又擁護社會主義道路的非劳动者的利益，對反動階級、反革命分子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經

過國民經濟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把我國引導向繁榮富強的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去。在整个社会發展过程中，起核心作用和指導作用的是由馬克思列寧主义武裝的中國共產党。沒有这个先决条件，就不会有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更不会有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

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为了增進自己經濟文化生活的發展，勢必要根据客觀形势的需要，設立一系列的机构、制度和法律，如政权机关、法律制度、人事制度、軍事制度、新聞政策、文艺政策等等。它們都是服务于人民民主專政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制度或个别环節。这些具体制度是体现和实现人民民主專政所必需的，但它不是絕對一成不变的。随着政治、經濟和階級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社会發展的需要，某些具体制度和机构可能因为失去作用而被取消，为新的具体制度和机构所代替。由此可見，个别环節与基本制度虽然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但是它并不等于基本制度，也不能簡單地把某些具体机构或制度相加以“組合”成基本政治制度。

說明基本制度与具体环節的关系和区别，就可以粉碎右派分子利用个别环節的缺点把它擴大到否定基本政治制度的陰謀。林希翎的演說中的主導思想之一，就是極力尋找具体制度中的缺点和錯誤，加以歪曲、夸张，根本否定各个战綫上的偉大成就。这样先把具体制度污蔑得一錢不值，然后又說把这些具体制度“綜合”起來就是我們的基本政治制度，最后的結論就是要“徹底改革政治制度”，要用“爆破性”方式革掉現存政治制度的命。这一最后結論就是这位“勇士”抹煞政治制度的階級內容，捏造、歪曲事实的最終目的。我們有的同志因为沒有看透她这种陰謀的伎倆，被她那些泡制过的花言巧語所蒙蔽，因此上了她的圈套，作了她的俘虜。

我國的政治制度同經濟基礎是適合的

林希翎大力渲染我們政治制度某些環節上的缺點、錯誤和矛盾，並從而認為我國的政治制度根本“不適合”當前的經濟基礎。這個估計到底是否正確呢？區別適合或不適合的基本標誌是什麼呢？如果不了解這個問題，同樣必然會上右派分子的當。政治制度（上層建築的主要部分）是否適合經濟基礎，這不是任何主觀捏造和惡意誹謗所能決定的。它是一個有生動實際生活內容的客觀存在。這裡最主要的標誌是：（一）政治制度通過各具體環節的活動是否保衛了工農勞動羣眾的政治民主權利，是否在實際生活中逐步鞏固和發展了民主政治生活；（二）國民經濟是否按照社會主義原則得到改造，特別是社會生產力是否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國家的經濟實力是否日益充實和加強；（三）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綜合這些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實際情況來考察政治制度是否適合經濟基礎，是粉碎右派分子的歪曲、誹謗和中傷的有力武器。毛主席在說明這一問題時指出，新制度代替舊制度的本身就說明了新制度是優越於舊制度。又說：“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比較舊時代生產關係更能够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難道有人能夠瞪着眼睛否認我國七年來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的巨大成就嗎？難道我們的政治制度不是捍衛並進一步發展了人民的革命成果和政治權利嗎？難道我們的鋼產量不是由十几萬噸增加到四百幾十萬噸嗎？難道我們的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業不是有很大的發展嗎？到一九五六年止，難道我們學生數量不是有驚人的發展嗎（同一九四九年比較，高等學校從十一萬六千人增加到三十八萬人，中等學校從一百二

十六萬多人增加到五百八十六萬人，小學從二千四百多萬人增加到六千三百多萬人），難道惡毒的誹謗能夠抵消我國工農勞動羣衆生活的逐步提高嗎？既然這樣，為什麼林希翎硬要高唱政治制度“不適合”於經濟基礎的謬論，要對這個政治制度進行“爆破式”的“徹底的革命”呢？這除了反動派和勞動人民的敵人以外，有誰會提出這種要求呢？

當然，說我們的政治制度適合於經濟基礎，並不等於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就沒有矛盾，也不是說我們制度的具體環節沒有缺點和毛病，更不是說我們的工作沒有缺點和錯誤。毛主席說：“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築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些矛盾主要表現為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矛盾，民主與集中的矛盾，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人員的官僚主義與羣眾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不僅過去有，現在有，而且將來也還會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表現出來，這是國家經濟政治活動中很難完全避免的。問題是如何對待這些矛盾，如何考察它並設法克服它。林希翎撇開基本成就和適合的方面不談，抓住這些本來難以避免的矛盾，加以夸大、歪曲，把它夸大為對抗性矛盾，夸大為產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站在反動的立場上來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

我國人民民主制度是剷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有力保証

林希翎大声疾呼：產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原因“应从社会制度來找”，“官僚机构”、“等級制度”、“特权階級”的人事制度、保密（擴大化）制度等，这些小的制度組成了总的制度，因此，对这个总的政治制度不能進行改良，而要“爆破”，要“革命”，要“触动基礎”，要“徹底改革政治制度”。

可敬的“勇士”，不要戴着資產階級的灰色眼鏡來觀察我們的事物吧！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不但不会產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反而是逐步剷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有力保証。真正体现着工農劳动羣众根本利益和远大前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身，就要求不断排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因为它是直接違背人民利益的。难道古今中外的反动統治者敢于揭發他們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嗎？歷史上有过这样的記載嗎？共產党發动人民羣众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進行坚决斗争的事实，不正說明我們的制度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互不相容嗎？这怎能說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是產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呢？

說什么“官僚机构”。我們这里沒有“官僚机构”，只有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勤務員和國家政权机关。只有統治劳动人民的反动分子才是官僚，只有統治劳动人民的机关才是官僚机构。把我們的國家工作机关看作反动派的官僚机构，把國家工作人員看成“統治”的“特权階級”，这完全是敌視社会主义制度的荒謬观点。

說什么“等級制度”。我們这里沒有“等級制度”，只有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职务上的分工，只有按社会主义原則獲得適當勞

動報酬的制度。封建王國的“家天下”才按照天子、諸侯、大夫、士，或公、侯、伯、子、男來劃分等級，分封爵位。把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污蔑為“特權階級”，把領導與被領導關係說成是“統治與被統治”，這是對共產黨和我們國家政治生活的無恥誹謗和中傷。除了反動派和右派資產階級分子外，每一個正直的公民都會給這種誹謗和中傷以有力的回擊。因為誰看不見絕大多數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為勞動人民而辛勤工作和勞動呢？誰看不見我們領導和被領導是同志式的分工與結合，共同為勞動人民創造幸福呢？只有懷有敵意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才會進行這種無恥的訛詐和攻擊，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說什麼人事制度不好，“不是以德、才衡量品質，而是看是否黨、團員”，是“靠資格吃飯”，是“按資格取酬”。我們且不談黨和國家的干部政策和干部分配的情況。這裡人們不禁要問，右派分子為什麼這樣痛恨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對革命事業流血流汗的老同志呢？難道他們不是緊緊地把自己的一切和勞動人民結合在一起，並帶動他們求得徹底解放、創造美好生活嗎？這種毒辣的攻擊，究竟又是反映什麼階級和集團的利益呢？

說到我們的人事制度，其標準就是德、才的結合。對革命有過重大貢獻的同志在生活上和工作安排上給予適當的照顧。沒有對人民事業抱高度政治責任感和高尚品格的人，他們是當不好人民勤務員的。只有政治條件而沒有工作才能的人，人民也不會把他們放到重大的工作崗位上去。如果借我們人事工作的某些缺點而否定這一制度，如果想以此而把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排除到政權和企業的工作之外，工農勞動羣眾是堅決不答應的。這種陰謀必然要遭到可恥的破產和失敗。

說什麼保密“擴大化”制度。我們只有保密制度，並沒有保密“擴大化”制度。保密工作可能存在一些缺點，可能有保密不嚴的失密現象，也可能有保密過嚴的現象，這些對工作都會發生

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如果認為保密制度就是“愚民政策”，就是“封建主义的作法”，就是“把人民羣众当成阿斗”，那就是荒謬透頂的胡說。任何一个政治制度下的新聞工作都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我們的保密制度和其他一切具体制度一样都是服从劳动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國家正在想尽一切办法使劳动者擺脫缺乏文化、缺乏科學技術的落后狀態，这怎能說是“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呢？这怎能說是对人民羣众“不信任”，把他們当成“阿斗”呢？莫非有人要把我們國家變成一个超階級的“自由世界”，要我們整天播送“美國之音”嗎？要把劳动人民的电台、報紙和雜志变成帝國主义的喉舌和傳声筒？如果是这样，那只能受到帝國主义的歡迎，但是劳动人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劳动人民根本反对那种对共產主义运动的污蔑和挑衅，反对那种战争挑撥者的歇斯底里，反对那种荒淫無恥的美國生活方式的宣傳。所以如果有人用“愚民政策”來威脅人民國家开放欧美“自由世界”的一切新聞，那只能是一种夢想。

（原載學習1957年第15期）

駁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論

孙曉村 馮和法

自从党开展整風运动以來，章乃器在帮助党整風的幌子下，連續發表了好几篇文章和談話，在这些言論中，章乃器为了达到反对工人階級領導，反对党的領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号召工商界不要再進一步自我改造的目的，以詭辯的方式，对几个基本問題作了性質極为嚴重的歪曲。在这篇文章里，我們想对章乃器所歪曲的几个基本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事实上，这是一些常識問題，由于章乃器的有意歪曲，难免有的人会給他迷惑，和他共鳴，所以我們認為这篇文章还是需要的。至于章乃器的言論因报章雜誌上都有登載，为節省篇幅計，本文內不再引用。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兩种制度的优越性問題

資本主义是一种人剝削人的階級剝削的最高形式，以生產資料資本家所有制為基礎；社会主义是消滅剝削和階級，以生產資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為基礎的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兩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我國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在世界資本主义已經發展到帝國主义的时期，也就是到了快將总崩潰的前夕，我國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外，是沒有别的道路可走的。这些道理，不僅毛主席教導我們很清楚，不少的書都已說得很清楚，而且，我國走社会主义道路已經由我國憲法明文規定下來，我國实际上也早已走上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所以；除了反革命分子，現在沒有一個人公然說要走資本主义道路，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因之，章乃器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誹